

中国美学的纵横论

马白著

为国守而能放浪形骸

趣舍万殊静躁不同

於所遇暂得於己

知老之将至及其所

随事迁感慨係之

欣俯仰之间以为

能不以之兴怀况

期於盡古人云死

不痛哉每揽此

暮春之初會

事備契事

故集此

又有清流激

湍觴曲水

於管弱之

暢叙幽情

ZHONG GUO MEI XUE ZI FEN HENG CHUAN

山頭大學出版社



中国美学纵横论

ZHONGGUOMEXUEZONGHONGLUN

马白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美学纵横论/马白著.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8

ISBN7-81036-618-1

I.中… II.马… III.美学思想—研究—中国
IV.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3355 号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515063

电话:(0754)2903126

印刷:汕头市达濠新兴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48千字

版次: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册

定价: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序

张少康

马白同志命我为他的论文集作序,本来,以我的学力与水平均不足以担当此任,但是作为同行,多年的老朋友,我又是非常高兴为他的新著说一点感想的。更何况现在已有学生为老师作序(如黄子平同志为谢冕同志的集子作序),那么,我这个“师弟”为“师兄”作序也可以通得过了。

马白同志这本书中的文章有不少我过去是读过的,有几篇曾发表在我们编辑的《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上,但是也有不少文章,这次是第一次研读。本书题名为《中国美学纵横论》,其实是比较系统地体现了马白同志对中国古典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完整的全面的认识和见解的。本书内容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总论,着重研究了中国古典美学与文艺理论的民族特点以及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科学研究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方法,这样方能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然而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抽象的现成条条框框,它必须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深入把握的基础之上。马白同志对中国古代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既广且深,能准确地抓住其基本的特点,作出比较透彻的理论分析,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关于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论述,就有许多切合实际、富有启发性的独立见解。

本书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一些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中国古代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但是像《文心雕龙》那样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很少,资料是庞杂的又是很分散的,要从浩如烟海的零星材料中寻找出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各种论述,加以归纳、总结、分析,探讨其内在的理论规律,是颇不容易的。马白同志在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的真实说、情性说以及对形与神、情与理、虚与实、动与静、心与物等文艺辩证法的论述中,对中国古典美学中具有鲜明民族传统特色的重要范畴,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与西方美学中的有关部分作了对比,既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又有丰富的资料,论证充分,是很有说服力的。本书第三部分是对《文心雕龙》的专题研究。马白同志这几篇文章既有对《文心雕龙》的宏观考察,研究它在中国美学史和世界美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又有对《文心雕龙》基本思想及其历史渊源的探讨,同时又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如“六义”说)作了具体的微观研究。如果说本书第二部分是属于面上的综合研究,那么这第三部分则是属于重要的点的解剖。由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到点面结合的研究,这就构成了本书完整的内在体系。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颇为重视,形成了一股热潮,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是令人振奋和欣喜的。但是,我觉得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种流于泛泛空论、比较表面而不扎实的现象。有些论著往往只是抓住一鳞半爪的几句话,就大加引申发挥,用西方的某些概念、范畴和论断来硬套,其结果往往使人感到似是而非,这自然是令人失望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引进西方的文艺和美学,并加以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吸取其先进的、科学的部分,但是这不能代替我们对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艺理论发展实际的深入研究,而产生上述现象的原

因主要就是对中国古代的文艺与美学缺乏真正的了解,因而总也说不点子上。当然,也有一些论著对中国古代的东西还是相当熟悉的,但对西方和当代的文艺与美学则知之甚少,因而缺乏应有的理论高度。马白同志这部书的主要优点,我以为正是在这两者的结合上做得比较好,他既对西方和当代的文艺和美学有较为透彻的把握,又对中国古代的文艺和美学相当熟悉,掌握了十分丰富的资料,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他在研究中又善于使这两方面自然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有说服力的见解,这样就能把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引向深入。中国古代文艺和美学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这对我们建设自己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艺和美学是非常有用的。我们期待着有更多像马白同志这样的论著问世!

◇

3

目 录

古代文论研究与当代意识	1
革新研究方法,开创古代文论研究的新局面	13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民族特点初探	31
论《易传》的美学思想	45
从《摩罗诗力说》看鲁迅与中国古代美学的渊源关系	62
中国古代文论的真实说	76
中国古代文论的情性说	93
形与神——文艺辩证法初探之一	114
情与理——文艺辩证法初探之二	132
虚与实——文艺辩证法初探之三	147
动与静——文艺辩证法初探之四	163
心与物——文艺辩证法初探之五	182

近年来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194
论《文心雕龙》在世界美学史上的地位	206
论《文心雕龙》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	221
论《文心雕龙》的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	237
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254
“天人合一”与《文心雕龙》	278
《淮南子》与《文心雕龙》	293
评刘勰的“六义”说	306
再评刘勰的“六义”说	317
后记	331
再版后记	332

古代文论研究与当代意识

古代文论研究如何在现有基础之上向前推进一步,使之出现新局面,这是近年来广大古代文论研究者十分关注并正在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问题的提出,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思想领域的活跃,古代文论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生气,一大批新人的成长以及具有新意的论著的问世,都说明了这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欣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逐步发觉,不少论文依然停留在原来论述的范围,使用的方法也千篇一律,而缺乏突破性的进展。这种状况就是广大古代文论研究者探索、思考如何开创新局面的现实基础。

古代文论研究如何开创新局面?我考虑,无非是要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新老方法并举,在论述范围内容探索上不断开拓新的广度、深度和高度。这样产生的论著才必然会发前人所未发,在先辈的基础上做出新的贡献。而这既和观念有关,也和方法有关。关于方法问题,早在1985年我就撰写《革新研究方法,开创古代文论研究的新局面》一文,对于古代文论研究可以试用的几种新方法,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方法与观念是不可分割的。要开创古代文论研究的新局面,除了革新研究方法外,还必须解决观念上的问题。观念问题的内容也比较丰富,包括文学观念、哲学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观念等等。本文仅从当代意识的角度,谈一下它与开创古代文论研究新局面的关系。

所谓当代意识是指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现实生活而产生的政治理想、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审美风尚的总和,是时代精神的折光。从纵向看,它与民族传统相交叉,一方面,一个民族的思想体系不同于其它民族,另一方面,这个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思想体系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从横向看,它又与时代精神相交叉,一方面,不同的民族、国家之中,当代意识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国家的当代意识却又反映出整个世界的历史内容和精神走向。当代意识正是这样一种既抽象又具体,既广泛又确定的矛盾统一体。每个民族、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都有它特定的当代意识。8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其当代意识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其基本内容是改革和开放,而具体构成则是主体意识、革新意识、综合意识、比较意识等等。

我们认为,自觉地从当代意识出发进行研究,是把古代文论研究引向深入的一条有效途径。

这首先是因为,任何民族、国家的有价值的文学理论体系、文学观念体系都是当代意识和民族特点的统一。且不论中国古代文论区别于西方文论的特色,即以古代文论本身来看,每一部分优秀的著作都渗透着强烈的当代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战乱的频仍,“独尊儒术”局面的结束,思想解放的实现,经学的衰落,玄学的兴起,这一切反映在当代意识上便是综合意识和主体意识的高扬。从综合意识来说,汉代流行的五行学说实际上是一种宇宙系统论,它已经突破了儒家今文经学支离蔓衍的局限性,要求人们从整体上去认识世界。但真正构成魏晋思潮特色的却是王弼提出的“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和“举本统末”的方法论,它启迪人们透过现象去探求事物的本质。正是这种当代意识使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建构了以“道”为核心的文学本体论。从主体意识来说,汉末以来所流行的清议和品评人物,

已经促使主体意识的萌芽,而蔚为风气的却是魏晋时期的个性解放,正是这种思潮使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以及刘勰《文心雕龙》在文学理论上强调了创作、欣赏过程中人的主体作用,重视了想象的因素,探讨了创作与个性、气质、禀赋等的关系。不仅上述著作,其它如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王国维《人间词话》等,凡是具有一定体系的著作,都不能脱离特定时期的当代意识而孤立存在。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

古代文论研究,同样如此。纵观古代文论研究史,我们不难看出,不同时代的著作具有不同的倾向和特色,这正是从不同的当代意识出发的结果。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清代以前的所谓研究,由于受儒家注经的观念和方法的影响,多为校勘和评解,很少涉及文学思想的分析。“五四”以后,在西方文论的浸染下,一批学者开始用新的思想观点来对古代文论进行理论研究,古代文论研究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此时才告出现。但他们的目光又仅仅局限于文学理论本身,以观念去解释观念,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出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表现出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只是到了建国以后,广大的古代文论研究者或多或少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古代文论进行分析和评价,揭开了古代文论研究史新的一页。这就是不同时代的著作所表现出来的当代意识的不同。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想以郭绍虞先生为例,来看即使是同一作者,在不同历史时期撰写的著作,由于当代意识具体内容不同,倾向和特色也是不同的。郭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初版于二、三十年代,作为一本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其开创意义十分重大。自然,本书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这就是作者在初版《自序》中所说的:“我总想竭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根据这种

客观主义的态度,作者更多的精力放在资料的搜罗剔抉上,而缺乏对于理论观点的深入分析。所谓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词,但应该说也多少符合一点客观实际。建国以后,作者自己认识到“我昔治学重隅隙,鼠目寸光矜一得”,因此决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此种愿望和动机是十分良好的。可惜,当时盛行苏联传入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贯串全部文学史的观点,作者不加分析,欣然接受,以此为纲,来改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了很多牵强附会的论断,成为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重要教训之一。从郭绍虞先生一生治学经历中可以看出,不论你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凡有著述都要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当代意识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有正确与否的区分而已。古代文论研究著作,要脱离当代意识而孤立存在,也是十分困难的。

其次,这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需要。我们对于古代文论,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在80年代的今天,我们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重新构建和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离开这一总目的所谓研究是不值得提倡的。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也应该既有当代意识,又具有民族特点,是两者的统一。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正确处理古与今的关系,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来构筑理论体系的框架,又吸收古代文论中的精华来丰富和补充理论分析和理论阐述。这样的做法,不是要求把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基本理论生硬地塞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去,而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和古代文论的具体阐述相结合,做到内在实质上的交融会合。要建立这样一种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来说,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去努力在古代文论中

梳理、发掘出某些与当代意识相沟通、相接近的思想,以便古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交融会合。如果说古代文论研究需要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那么,我觉得这是十分重要的方面。现在的问题是:难道古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之间有相沟通、相接近的思想吗?我认为,如果抹煞两者之间的界限,把古代文论的某些理论观点看成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观点,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但是说两者有相沟通、相接近之处,在理论上可成立,在事实上符合客观实际。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相沟通、相接近”,实际上是一种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而不是绝对的相同。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正是这种情况。古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虽然产生在不同的时代,但未始没有相沟通、相接近之处。以辩证法来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然不能与古代社会的朴素辩证法同日而语,然而,既然是辩证法,两者之间不可能不存在相沟通、相接近之处。古代文论中充满着朴素辩证法的因素,即以这一点而言,它完全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相沟通、相接近。例如,按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文学创作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是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相结合的结果、矛盾运动的产物。没有主体或者没有客体,都难以形成创作。与此类似的观点在古代文论中是否存在呢?应该说是存在的。古代文论当然不可能认识到文学创作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是它已经完全认识到文学创作是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统一。例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物色》、《明诗》、《诠赋》、《神思》等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运动,正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的交互作用,形成艺术

形象;而且,深入揭示了艺术构思中心(主体)物(客体)交融的具体过程:一方面是“随物宛转”即要求作家遵循事物的内在规律,把握对象的特殊性,使内心与外境相符合;另一方面是“与心徘徊”即要求从作家的内在需要出发去驾驭客观事物、描写客观事物,这时的客观事物已经是主体化的而且经过改造了的,已经不再是一种纯客观的东西。文学创作正是这样的产物。刘勰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辩证观点,难道能够说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之间毫无相通、相近之处吗?

不仅如此,有的古代文论研究的成果,即对于古代文论精华的梳理和发掘,还可以用来补充、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具体论述。比如,形象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按照传统的讲法,只是以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去揭示它的形成过程和具体构成,而缺乏深入的论证。古代文论的论述,相对来说要丰富一些。古代文论认为,文学形象按其产生过程说,经历了物象→意象→形象的过程。物象指的是文学作品描摹的客观对象,苏轼在《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中所说的“摹写物象”,就指的是一种客体。这种客体在艺术构思过程中要经过主体的改造,即产生心物交融的过程,而形成主客观的统一体,由于此时它仍然存在于作家的头脑之中,所以称为意象。司空图《诗品》所说的“意象欲出”就指的是这种状况。而一旦用语言的物质手段把它固定下来,使之成一种物化形态,就称之为形象。除此之外,古代文论还用形与神、一与万等文艺辩证观,揭示了文学形象塑造中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关系。适当地吸收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对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不无裨益。而其前提是要从当代意识出发,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否则,要梳理、发掘出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相沟通、相接近的思想,就会产生一定的困难。本来,主客体统一的思想,在刘勰

著作中是一种客观存在,过去之所以未被发掘出来,就因为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一武器去进行探索,而一旦从角度加以考虑,主客体统一的思想便立即脱颖而出。这充分说明当代意识对于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性。

再次,古代文论研究要有助于古代文论的走向世界。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世界范围内四大独立文学理论体系之一,它的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目前,它正在受到世界各国愈来愈多的人的注目和重视,它在世界文学理论史上的特殊、重要的地位,正在日益明确之中。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正是建国 50 余年来,广大古代文论研究者辛勤劳动的成果。过去,由于古代文论的自我封闭性,加上“以古注古”的研究方法占统治地位,这一切曾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各有自己特殊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两者之间泾渭分明、截然不同,不存在可比性。既然难以比较其异同,古代文论走向世界就成了问题。实际情况当然并不如此。应该承认,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由于产生的社会条件、民族传统等因素,各自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不仅理论体系不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也有区别。但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之间不存在共同之处,不能加以比较和沟通。不论是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西方文论,都是对于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是对于文学创作客观规律的揭示,因此,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共同之处。这就说明是存在着可比性的。古代文论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立脚点。什么叫古代文论的走向世界?我觉得,至少包括下面两层内涵。第一,经过科学的诠释与说明,它所特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能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第二,经过异和

同的比较分析,可以区分出哪些概念、范畴是中国所特有的,哪些概念、范畴是世界性的,从而提炼出古代文论的精华部分,去丰富世界文学理论宝库。为了推动古代文论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当前摆在广大研究者面前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当代意识的指导之下,开展中西文论的综合比较研究,在两者的同中去求异,异中去求同。在这方面,海外华人学者由于独具的条件,起步较早,成绩卓著,其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比如,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侧重点在于异中求同。他把中国古代文论按照西方文论的分类标准,分别分为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和实用论六种,这样的分类是否妥当,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觉得这本著作给人以最大启示的在于,他在进行中西文论的综合比较研究时,往往揭示并指明了两者的类似点。他曾指出,严羽、王夫之、王士禛、王国维关于境界的一些观点,与杜夫润、英格登等现象学家的观点有相似性。同时,他进一步指出,所以存在这样的相似性,其根本原因在于现象学哲学与道家哲学之间存在相似性。结论本身是否可靠姑且不论,这样的综合比较,对于从世界文化背景这样一个较为广阔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应该说是一种重要的有效的方法。如果说,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重点在于探索异中之同,那末,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同样运用中西文论的综合比较,侧重点却在同中之异。例如在分析王国维关于诗人进行文学创作兼有“能出”、“能入”两种态度的观点时,叶嘉莹一方面指出,王国维上述理论曾经受到康德、席勒所倡导的文学起源于游戏说的影响,并与西方美学中的“距离说”暗合,另一方面又明确认为:王国维“所提出的‘出’‘入’之说,既非袭自西方

美学中之距离说,因此他的说法虽与之有暗合之处,可是他的‘出’‘入’二字所指的范畴与距离说之但指欣赏时美感的距离之说法,也就并不完全相同。”^①正国为经过这种同中之异的分析比较,我们才能认识到,王国维的“出入”说既非个人独创,又具特殊的意义。由此可见,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进行中西文论的综合比较,无论是推动古代文论走向世界,还是促进古代文论研究突破现状,都是重要的一环。而进行中西文论的综合比较,关键在于确立可比性,即将中西文论中某些近似的观点加以比较,否则,无法进行此种综合比较。而确立可比性的关键在于是否从当代意识出发。如果运用当代意识、则可以发现:神思与想象、兴会与灵感、体性与风格、情志与思想感情、“出入说”与“距离说”、“境界说”与现象学……两者之间都有近似之处,都具有可比性。如果按照“以古注古”的说法,则神思就是神思,不能近似于想象;兴会就是兴会,不能近似于灵感;体性就是体性,不能近似于风格……既然如此,怎样进行中西文论的综合比较呢?又怎能使古代文论走向世界呢?从古代文论要走向世界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意识也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几个方面,就是我们提倡从当代意识出发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理由。

这样的提倡是否会导致将古人现代化的弊端合法化?肯定会有人提出疑问并产生如许的担忧。对此是必须辩明的。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将古人现代化的倾向必须反对,从当代意识出发进行研究的做法必须提倡。它们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不能认为提倡从当代意识出发必然会产生“现代”化的倾向,也不能因为曾经出现过“现代”化的倾向而不敢提倡从当代

^①《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75页。